



1-7

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The Original Text of James Legge's *Chinese Classics: The Tso Chuen*

羅軍鳳 (Luo Junfeng) **

一、前言

現今學界對理雅各的研究，一般從整體把握理雅各及其譯作的特點，香港浸會大學費樂仁 (Lauren Pfister)，以及美國利哈伊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的吉瑞德 (N. J. Girardot) 等學者在多種語境中論述理雅各的多重身分，尤其從傳教士的角度切入討論理雅各的成就獨樹一幟。理雅各的英譯儒家經典中，《四書》、《詩經》、《禮記》等經典相對引人注目，而對於理雅各《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第五部《春秋附左傳》(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 的研究則是冷門，除了劉家和先生和香港浸會大學合作研究之外，尚無人以此為研究的主要方向。劉家和主要討論理雅各對《春秋》及《左傳》的基本態度和意義、價值問題，¹ 在學界有開創之功，但是仍留下很多研究空間。本文通過考論理雅各翻譯《春秋》時所用底本的來源，論述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與《春秋》三傳及其他傳注之間的關聯。

二、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的底本來源

《春秋》在先秦本以單行本流傳，《漢書·藝文志》記載：《春秋古經》十二卷，《經》十一卷，分別指《左

傳》及《公羊傳》、《穀梁傳》的經文，則至漢代，《春秋》已有古文經與今文經的分別。漢代以後史志目錄中所見《春秋》或一卷，或二卷，或十三卷，學者都認為是從《春秋》三傳附帶的經文中截取而來。三傳各附《春秋》，文字不盡相同，理雅各《中國經典》第五部《春秋》的文本，時而用《公羊》經文，時而用《穀梁》經文，又時而用《左傳》經文，《春秋》異文的選取難於捉摸。更有甚者，經文用《公羊》、《穀梁》，注釋中卻批判《公羊》、《穀梁》之說，轉用《左傳》義；或者經文用《左傳》，義卻取《公羊》、《穀梁》；甚至三傳並棄，直接闡發意義。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對《春秋》異文的擇取並無衡定的標準，《中國經典·春秋》的底本來源則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話題。

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的〈前言〉(Prolegomena) 中，明確地說：《春秋》文本取自《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簡稱「康熙《春秋》」(K'ang-he Ch'un Ts'ew)，並認為：康熙《春秋》的編者 (K'ang-he editors) 通常支持《左傳》的文本，但是偶爾用《公羊》、《穀梁》的文本，如隱公三年「尹氏卒」。編者沒有告訴我們三傳異文的擇取標準和偏好問題。²

1960 年香港大學出版社的《中國經典》第二版曾經根據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理雅各〈勘誤表〉(A number of errata)，對《中國經典》第一版中的錯誤有所更正，

* 中國大陸國家社科基金 2012 年資助項目；教育部 2009 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資助專案，專案號 09YJC751069；西安交通大學學科交叉專案。

** 作者現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1 劉家和，〈理雅各英譯《春秋》及《左傳》〉，見氏著，《史學、經學與思想》(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2 "Prolegomena," *The Chinese Classic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Vol. V, p. 19.

但仍然保留了這個勘誤表 (errata)，置於目錄之後。《中國經典》第五冊與眾不同的是，在《春秋》經文的勘誤後有三行的小字提示，據此可以知道，《中國經典·春秋》第一版的文本錯誤是比照「康熙《春秋》」加以改正的。

康熙《春秋》不專主一家，從理雅各這個旁觀者看來，康熙《春秋》的去取難於理解，如果說這是一個缺少參照體系的一個外來人的正常反應的話，那麼，關於《春秋》異文的疑問則完全轉向了康熙《春秋》自身，《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是否有所本呢？

這要考慮《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的編纂背景。康熙初年便開設經筵日講，對於《春秋》一經，基於對宋胡安國的《春秋傳》「尊王」觀念的認同，康熙帝特別尊崇，經筵日講中「一以胡傳為宗」，³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制日講春秋解義·序》與胡安國《春秋傳·綱領》完全合轍。經筵講本則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乾隆二年經過修改，方甫付梓，名之曰《日講春秋解義》。隨著清初以來科舉考試中胡傳穿鑿附會之風的愈益浮現，以及民間學界革除胡傳的呼聲越來越高，清代帝王也注意到了胡傳在經義闡發上的附會與妄斷，所以最終刊刻之時（乾隆二年），有意識地對它原本「一遵胡傳」的做法作了修改。康熙晚年，康熙帝因不滿自明以來《五經大全》這等皇家頒佈的科舉用書專以宋代傳注為準，所以主張搜集科舉考試中被宋注日益湮沒的各家傳注，「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⁴ 以使士子探求經書的本來面目，⁵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即針對胡傳的一統地位做出反撥，搜採自《春秋》三傳以來各家傳注達 134 家之多，而胡傳只是作為其中一種附贅在三傳之後，《彙纂》使胡傳之外的其他傳注走入經義闡釋的體系之中，而欲代替明《五經大全》對清代的科舉考試發生影響。也可以說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廢除了早年康熙經筵日講（《日講春秋解義》）中胡傳的一尊地位，是康熙帝自身尋求自我完善、適應新的學術環境的一個縮影。那

麼，是否《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與《日講春秋解義》全無關聯了呢？

三、《中國經典·春秋》與《春秋》三傳及其他傳注的關聯

《日講春秋解義》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二書同為清代內府刊刻，同與康熙帝有關，二者的《春秋》文本都標示了三傳異文；雖然《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較《日講春秋解義》成書要早，但是《日講春秋解義》是康熙幼年即講習的經筵舊稿，早已成稿，只是尚未發佈而已，兩相對比，可以明顯地看出，這兩個文本有直接承襲的關係，後者的經文完全承繼承了前者。早在《日講春秋解義》階段，御用學者就已經標明了三傳異文，《彙纂》只不過是直接逐錄而已。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春秋》時，參考了康熙年間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但是沒有參考康熙帝的《日講春秋解義》，自然他不知道他眼中不明所以的《春秋》文本淵源有自。到現在，問題焦點集中於《日講春秋解義》，它的底本又出自哪裏？

《日講春秋解義》每列一條《春秋》經文，都標示三傳異文，接著羅列《左傳》、《公羊》、《穀梁》、胡傳等四家傳說，簡稱「四傳」，其後加以簡短的斷語。如此簡潔明瞭的模式，清晰地展現出《春秋》經文與《春秋》三傳及胡傳的關係。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三傳異文難於捉摸的狀況相比，《日講春秋解義》中三傳異文的取捨直捷而明瞭：大多數情況下，《春秋》經文與胡傳一一對應，即胡傳採用《公羊》的觀點，經文便是《公羊》的經文，反之，胡傳若因《左傳》而生發義理，《春秋》經文便不取《公羊》、也不取《穀梁》，而是採用《左傳》的經文。

《日講春秋解義》中《春秋》經文與胡傳如此緊密關聯亦不難理解。《日講春秋講義》本來「一遵胡傳」，從這一淵源看，它與胡傳的聯繫是天然的。索性將胡傳

3 《聖祖仁皇帝御制日講春秋解義·序》，《日講春秋解義》，（《四庫全書本》）。

4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首，（《四庫全書本》）。

5 乾隆《御用制日講春秋解義序》，《日講春秋解義》（《四庫全書本》）。

與《日講春秋解義》對照比勘，可以肯定《日講春秋解義》的經文即來自宋胡安國的《春秋傳》，只不過胡安國的《春秋傳》沒有標示三傳異文而《日講春秋解義》則明確標示三傳異文。這樣，關於《中國經典·春秋》的底本就水落石出了：《中國經典·春秋》的底本來自《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的底本是《日講春秋解義》，而《日講春秋解義》的底本是宋胡安國的《春秋傳》（胡傳）。《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因為處在這個層遞修訂的《春秋》版本中的最後一環，所以已經很難看到其經文文字的取捨原則了。筆者試舉若干有代表性的三傳異文，分別列舉《左傳》、《公羊》、《穀梁》、胡傳、《日講春秋解義》之說，以及《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之「案」語、理雅各《中國經典》的相關注釋，逐條比對，考察《中國經典·春秋》與《春秋》三傳以及其他傳注之間的關係。

（一）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⁶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春秋》于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于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日講春秋解義：尹氏，王朝世卿。……尹氏秉鈞，為周階亂，見於家父所刺。考之《左氏傳》，世執王朝之政，《春秋》於其告喪與「立子朝」、「以子朝奔楚」皆以氏書，以著世卿之失，為後世戒。「武氏」、「仍叔之子」皆此義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案歐陽氏修曰：「《公羊》、《穀梁》以『尹氏』為正卿，《左氏》以『君氏』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馬氏端臨曰：「《左傳》經文『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公》、《穀》經文『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然則夫子所書『夏四月辛卯卒』者，竟為何人乎？」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兩存之。

理雅各《中國經典》：「尹氏」所指為何，完全不可知。「尹」，《左傳》作「君」，「君氏」意即尊貴的太太，指隱公的母親。《公羊》和《穀梁》都作「尹」，認為「尹氏」是周王室的某個世卿，……。另有多種解釋，其中最有可能的一種解釋是毛奇齡所強烈支持的金履祥的意見，認為「尹氏」其實是鄭國的一個大夫，此人在《左傳》隱公十一年中另有出現。

筆者按：胡傳秉承《公羊》義，所以選用《公羊》的經文。《日講春秋解義》照搬胡傳，只不過表達有所不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不再偏袒胡傳，所以不取《公羊》；但又不遽定《左傳》，「故兩存之」，但是《春秋》經文仍如胡傳採用《公羊》，可見因襲難改。

《左傳》和《公》、《穀》皆是一家之言，均不具備壓倒性的優勢，取代其他。理雅各所支援的解釋（毛奇齡）有史實依據：《左傳》隱公十一年隱公被弑情節中附帶而出的「尹氏」即此「尹氏」。在三傳不能自圓其說之際，理雅各這種注重史實依據的解釋，誰又能第一眼就表示反對呢？

（二）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履緌，《左》作「裂緌」。

左傳：九月，紀裂緌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6 《春秋》經文及四傳節取內容，均出自《日講春秋解義》（《四庫全書本》）。《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亦用《四庫全書》本。

胡傳：……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

日講春秋解義：履綸，紀大夫，伯姬，魯女，許嫁于紀者也。書「履綸逆女」，譏紀侯之不親迎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在三傳之後採眾多觀點，諸如孔穎達、劉敞、程子、陳傅良、張洽（履綸，紀未賜族之大夫也）、俞皋、齊履謙、程端學之論，迭出新義，不定於一。

理雅各《中國經典》：裂繻是紀國的大夫，「逆女」即為國君迎娶新娘，如果他去魯國是為自己迎娶新娘，則應說「逆某姬」。他來魯國是國君派遣的，但依照有關「婚姻的規定」（rule about marriage），他的舉動不合於禮。

筆者按：《公羊》和《穀梁》熱衷於解釋此不合常禮的「大夫逆女」事件中譏諷了誰。胡傳綜合了《公羊》（譏國君不親迎）、《穀梁》（譏世卿）之義，取《公》、《穀》異文而不用《左傳》。《日講春秋解義》只取《公羊》之義，仍用《公羊》經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集眾家之說，其說早已超出《公羊》、《穀梁》之外，且不作案語，實際上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同時消解了《公羊》的權威性，已看不出《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此處經文擇用《公》、《穀》經文的原由。

理雅各沒有引用三傳，而是參考「婚姻的規定」，說明《春秋》此條記錄了一個不合規定的迎婚儀式，至於《春秋》用「裂繻」還是用「履綸」，他是不以為意的。此處「逆女」與「逆某姬」的規定，理雅各採信的當是毛奇齡《春秋毛氏傳》：「逆女者，卿為君來逆女也。《釋例》：天子娶則稱『逆後』，卿為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為娶，則稱『逆某姬』。」⁷ 毛奇齡徵引的杜預《春秋釋例》與《四庫全書》本《春秋釋例》不

同，也與阮刻《十三經注疏》中孔穎達徵引的《春秋釋例》不同：「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迎之字。」⁸《春秋釋例》中並無「逆某姬」之詞，唯毛奇齡《春秋毛氏傳》中徵引《春秋釋例》出現了「逆某姬」的字樣。毛奇齡引書好改字，在當時即有惡評，理雅各雖未明確說出他的引文出處，而他對毛奇齡的《春秋毛氏傳》佩服有加，甚至一度想直接翻譯《春秋毛氏傳》而不是翻譯《左傳》，⁹ 從他襲用毛奇齡的訛誤可知，此處他一定參考了毛奇齡的《春秋毛氏傳》。

（三）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伯，《左》作「帛」。

左傳：子帛，裂繻字。莒魯有怨，紀侯昏于魯，使子帛盟莒，結好以和解之。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按：長）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胡傳：（「伯」是闕文。）……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日講春秋解義：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繫子，無其國，此闕文也。闕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無王，王不稱天之類，以大義削之，而本非闕也。至於舊文脫簡，無從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卷帙散亡，經師口授，訛舛莫稽，而後儒又因之，不得不闕者。雖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增損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在《公羊》及胡傳之後加集說：啖氏助曰：「《穀梁》云：『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此闕文耳』（按此處有誤），云『伯』之穿鑿甚矣。《左氏》云：『魯故也。』以子帛為履綸字，故附會耳。」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於密。』《左氏》附會作

7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四庫全書》本），卷3。

8 杜預，《春秋釋例·內外君臣逆女例第十》（《四庫全書》本）；《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標點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2。

9 “Prolegomena,” *Chinese Classics*, Vol. V, p. 141.

『帛』，杜預以為裂縐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家氏鉉翁曰：「於蔑，內盟之始也，於密，外盟之始也。內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為盟也。」吳氏澄曰：「『子伯』二字或是『侯』字之誤。」

理雅各《中國經典》：杜預認為子帛是裂縐之字，《公羊》說子伯無聞也，《穀梁》將「伯」當作動詞解，認為紀國國君認為自己是個「伯」爵，所以在盟會中排在莒子之前。這當然是荒唐的，紀國本是「子」爵。吳澄（1249-1333）認為「子伯」二字是「侯」之誤。按杜預的觀點更易為人接受。

筆者按：《左傳》用「紀子帛」，《公》、《穀》用「紀子伯」。三傳的重心在於紀子伯與莒子二人的尊卑排序上。《左傳》認為前者是紀國的大夫子帛，胡傳不採用這種說法，其實是認為，身為人臣，子帛不應排在莒國之君（莒子）之前。《穀梁傳》認為紀國的國君（紀子）年長於莒國的國君，所以排序在前，而《公羊傳》不知道排在「莒子」之前的「紀子伯」是誰，故闕疑。胡傳即引申《公羊》之義，採用《公羊》之文。《日講春秋解義》明確指出紀子伯不當是紀國國君，也不當是紀國大夫，故闕疑之，此義不出胡傳的範圍。《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不錄《左傳》、《穀梁》的說法，集說均不支持《左傳》，而且否定了《穀梁》，並提出了另外的可能性（如「子伯」二字當是「侯」字之誤），不用《左》、《穀》之義，但也沒有採用《公羊》。胡傳尚能尋覓《春秋》此處異文與《公羊》之間的聯繫，到了《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春秋》經文與《公羊》的關係已無從捉摸。

理雅各支持杜預的說法，將子帛看成是紀國的大夫，不理會盟會中的君臣尊卑之理。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經典·春秋》此條，取義於《左傳》，但文取《公羊》、《穀梁》。《穀梁傳》：「伯，長也。」理雅各把「伯」理解為意動用法，「把……當作伯」，這是言語翻譯的一個硬傷。

（四）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倅。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彥父勝之。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托始焉爾。曷為托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胡傳：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日講春秋解義：向、極皆國名，入者以兵，造其國都，得之而不居也，其義為逆而不順。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其不率者，則大司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魯無王命，而擅入人國，天王不能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集說：……劉氏敞曰：《公羊》以謂入者滅也，無駭不氏者，疾始滅也，非也。《春秋》雖為國諱，然皆使其文不害實，今更滅為入，則是文害實也。且無駭不氏，亦非疾始滅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案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既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者也。……

理雅各《中國經典》：無駭是魯國的官員，是王室的一個分支，尚未獲得族名。《左傳》說他是魯國的司空，此時他被費彥父所敗。

筆者按：《公羊》、《穀梁》在無駭不稱氏的書法中穿鑿褒貶。胡傳承《穀梁》義引申而來，卻用《公羊》和《左傳》的經文。「無倅」和「無駭」指同一人，不牽扯意義的解釋，而「無駭」較《穀梁》作「無倅」更常見，所以從常見字體。《日講春秋解義》遵從胡傳，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劉敞一說則同時否定了《公羊》和《穀梁》，也不再贊同胡傳牽強附會的解釋，更難看出其文本出自何處。

理雅各不理會名字未氏的褒貶，而是客觀指出「無駭」尚未賜族。《左傳》杜注：「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隱公）八年。」¹⁰ 理雅各注釋《春秋》，不支持《公羊》、《穀梁》中善惡褒貶之說，一般相信《左傳》的敘事，從史實中尋求《春秋》的意義。「無駭不氏」的觀點即采自《左傳》杜注。

（五）文公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傳：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當圍宋矣。……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日講春秋解義：此書伐「以救」何？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晉襄……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畏怯甚矣，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傳與胡傳之後，集孫復、陳傳良、張洽、吳澄、汪克寬、王樵等眾人的說法，均不支持胡傳的微言大義。後加「案」語：……故晉之罪在於不能存江而伐楚，以救江則未見其罪也。胡傳行世已久，先儒多從之，今仍其說而附見此義云。

理雅各《中國經典》：《公》、《穀》「救」之前無「以」字。康熙《春秋》的編者在此條中加入了晉國的所作行為，以此反對胡安國以及其他類似的意見。

按：胡安國在《左傳》的「以」字中闡發微言大義，不用《公》、《穀》略「以」。《日講》、《匯纂》沿襲胡傳，而《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所集之例無一支持《胡

傳》的微言大義，案語直是針對胡傳而言，但是編者又明言「胡傳行世已久，先儒多從之」，故仍錄胡傳於前，而《春秋》經文也是由於胡傳推行日久，直接錄自胡傳。

理雅各提及的「晉國的所作行為」，即《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案語」中所列舉的晉國為救江而做的種種，與胡傳所云「晉不能救江」形成反對之勢。理雅各只是簡單提及了康熙《春秋》編者的態度——反對胡傳，至於正方和反方的具體觀點，均未提及。理雅各自己是否定在「以」、「與」等單詞片語中穿鑿微言大義的，¹¹ 但是否定歸否定，理雅各仍然要介紹康熙《春秋》的編者對科舉傳統標準——胡傳的否定，似要告知讀者中國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對影響天下讀書人的科舉考試的看法。《中國經典·春秋》的注釋中，胡傳被當作「幾百年來科舉考試的標準」而被重視，¹² 理雅各似乎不知道在當時胡傳已經廢除，對科舉的影響已經式微。另者，雖然康熙《春秋》發佈之時，胡傳仍未廢，但康熙《春秋》是一部消除胡傳影響的書，理雅各並不措意於此，而是在《中國經典》中，頻頻提及胡傳，有時並未加評論，似乎將它與康熙《春秋》的觀點一起，作為認識中國知識界思想的一個手段。而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就廢除了胡傳，代之以《左傳》，作為《春秋》一經的標準，¹³ 之後又在道光二年（1842）由內府刊刻《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作為科舉考試中《左傳》的參考。理雅各《中國經典·春秋》中對清朝《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並未引用，儘管或許有很多客觀的原因，但是忽略這一節，可以說明理雅各對清代儒學的瞭解及其對中國思想界的瞭解並不全面。

四、結 論

以上用例集中於隱公二年與三年，因為這些異文在各家論述的重心，理雅各對此的抉擇更容易看出它對

10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標點本，頁65。

11 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穿鑿「及」字之意，理雅各認為「及」僅表示「與」的意思，而《公》、《穀》等注家認為裏面有晦澀難懂之義，這都是難以檢驗的。（*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V, p. 5.）

12 "Prolegomena,"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V, p. 137.

13 參見羅軍鳳，〈清代《左傳》經學與科舉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7.4: 115-121。

《春秋》三傳異文的態度。總結以上用例可知，在胡傳中，文字的選取決定於意義的取捨，在三傳之中，取某義，即用其對應的經文。如果用《公羊》義，則斷無用《左傳》經文的理，反之，用《左傳》經文，卻不見得採用了《左傳》的義理。胡傳因為沒有摘錄《春秋》三傳，所以並不能清晰地看到其文本的淵源，《日講春秋解義》因為羅列三傳與胡傳，並加以評論，所以能較為清晰地看到胡傳的文字取捨，以及《解義》與胡傳意義上的淵源。一般情況下，《日講春秋解義》作為經筵舊稿，初期是與胡傳同一步調的，康熙末年在修《彙纂》時雖雲欲對其刊正，具體的刊正已無從得知，但是刊正的幅度，還是可以大抵看到的。《解義》大體上更接近胡傳，與胡傳大多保持一致，但是《彙纂》則不一定了。《日講春秋解義》頗能看清胡傳所自出，而《彙纂》一則因為搜集眾家之說，不容易看清文本所出；二則主動消除了胡傳的一尊地位，所以更不容易看出其文本出自胡傳。

理雅各認為「康熙《春秋》」偏信《左傳》，這也是誤解。《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雖然對胡傳有主觀性頗強的修正意願，但是仍使用相沿已久的胡傳作底本，其解釋《春秋》時仍不自覺地受胡安國的影響，主《公羊》、《穀梁》義。在胡安國看來，「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胡氏《春秋傳》毫無疑義以「義」為主腦，採用《公羊傳》、《穀梁傳》之義頗多。即便採用《左傳》的文字，隨後生發的微言大義的卻超出《左傳》的敘事之外。例如例五，用《左傳》的「以」字闡發晉國有罪無罪；又如桓公十一年「公與姜氏遂如齊」，用《左傳》經文，比《公羊》、《穀梁》多出一個「與」字，《彙纂》集胡傳及葉夢得、趙鵬飛、吳澄、汪克寬等人的議論，

紛紛在「與」字中穿鑿微言大義。以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為主的中國帝王注疏體系中，《春秋》的義理由《公羊》、《穀梁》的義理支撐，《左傳》的敘事性作為基本要素存在於注疏之中，而不是作為重要元素，所謂「康熙《春秋》」偏重《左傳》，並不是事實。只有在乾隆五十七年廢除胡傳之後，才真正廢除胡傳在《春秋》一經中的主導性作用，至道光二年頒發的《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則完全以《左傳》之事解經。至於理雅各本人，認為《春秋》是史書，簡單的敘事中陳述事實而已，沒有許多褒貶之說（如例二），《左傳》的敘事不僅是基礎，更是獲解《春秋》敘事的重要元素（如例一、三、四），意義如果不能獲得史事的支持，那種高遠玄妙，是理氏所不能理解，也不能贊同的，但是出於瞭解《春秋》中影響頗為深遠的封建帝王以及帝王身邊學者群體的觀點，仍會逐錄康熙《春秋》編者的意見（如例五）。

理雅各採用的《春秋》文本，綜采三傳，原本認為《春秋》三傳均來自於孔子，都能從某一側面獲取孔子之義，理雅各的《春秋》經文綜合三傳異文，或許意欲於三傳中發覆孔子的真義，但在實際翻譯中，理雅各卻懷疑《公羊》、《穀梁》是否能達成聖人的《春秋》之義，他根本不贊同《公羊》、《穀梁》的解經方法，認為它們「難以接受」、「荒唐」，而偏向於提供了大量歷史細節的《左傳》。理雅各不是在《春秋》中尋找褒貶之義，而是借助《春秋》傳注在《中國經典·春秋》的簡短文字中尋找史實。奉行《公》、《穀》之義、暢言褒貶的康熙《春秋》的編者遭受了來自譯者的諸多質疑與不滿。至於《中國經典·春秋》與康熙《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為代表的清代帝王之學的更深層關係，容筆者另撰文討論。